

天性

黎白著

解放军出版社

淳朴善良、勇敢

刚毅的搬运工李元，

为救战友身陷

囹圄，狱中

与战友刘保元、傅元

孟江春元结为生死之

交，尔后三人越狱奔逃

仇人，进入敌国

至最先归顺到人民的

革命行列。

民党旧军队，同处于

卑劣的环境，李元却

迥异于他三人，对吃喝

以富家的第一注

傅元

既捆绑骗等

腐败恶行，行为深

恶痛绝，终不入流以

革命行列。

作

品

以富家的第一注

天性

黎 白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天 性
黎 白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5-0456-1/I·61

定 价, 3.40元

古老、残破、凄凉而又畸形、繁华的北京。

前门箭楼的墙上，涂抹着几条引人注目的大标语：“剿灭共匪，强化治安”、“中日提携，共存共荣”、“歼灭共匪，完成大东亚圣战”以及“王道乐土”等等。在标语上边的箭楼楼顶飘着两面旗子，一面是大白地儿中间一个血红的圆球——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细心的人准能发现这后面一面旗子和“国旗”有区别，在边边上加了一条带子似的東西，上边写着“防共和平建国”几个黑字。这是汉奸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二把手”的身份离开重庆来到南京，公开组织了伪政府而制定的旗子，表示汪记政府是真正的国民政府，所以国旗不必改样子，又表示与蒋介石虽无本质区别，却又多少有点儿区别，就加了这么几个字儿。其实。门楼子上挂什么旗，北京的老百姓连看都懒得看。成天喝着棒子面粥，有了上顿愁下顿的饥民们，与其注意这些个倒不如关心一下物价又涨了多少更为实际呢。这只要来到不远处的前门火车站，世事的险危凋敝与人民的困苦情景，便一目了然。

冰凉的洋灰地上，到处是躺着的、坐着的、倚着的、挤满的人。他们有的穿着破棉袄，有的披着麻包片，有的伸出乌黑的手向行人讨钱，有的则抱着个破包袱，缩在那里

发抖。

车站外，熙熙攘攘地挤着来往的旅客。收票口，有两个挂着白色胳膊箍的稽查，他们手里拿着三尺长的铁探条和皮鞭子，横眉立目地搜查着旅客。有几间检查旅客的小屋里不时传出妇女的尖叫声和日本宪兵淫荡的笑声。一会儿，几个衣冠不整的青年妇女，提着包袱，抽抽泣泣从小屋里走出来，走出车站。又一会儿，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妇女大摇大摆从查票口走出来，日本宪兵毕恭毕敬地护送着，脚行工人——“红帽”给扛着箱子、提着皮包跟在后边，中国稽查们都立刻躬着身、带着笑，目送着日本贵妇迈着碎步乘上汽车，然后，立刻又换了脸色，横眉立目地检查着中国旅客。

车站里头，日本宪兵手持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凶狠地来回查看着。列车进站、出站，为生活奔波的旅客们上上下下，大人叫，小孩哭，老人叹气，汽笛长鸣，小贩叫卖，日寇骂人，货物从车厢上抛下，扛货的苦力——“红帽”的拉号子、吆喝，工头的鞭子抖得山响……这一切的嘈杂、喧嚣、痛苦、烦恼……笼罩着整个前门火车站的里里外外。连天空都被乌黑的烟煤遮没了，用力看时，透过乌烟瘴气或许能看见城门楼子上那两面旗子低垂着，在黑色的包围中微微地飘动着。

在嘈杂人声中，有一队扛着笨重箱子的搬运工人，他们穿着红蓝两色的“号坎儿”，在严冬天气里，有的光着脊梁，肩上垫着破麻袋片，有的穿着破夹袄，有的穿着露出黑灰色棉花的破棉袄。他们吆喝着，喘吁吁地在站台上搬运着货物，吃力地走着。他们的职业是火车站上的搬运工，日本人和准日本人管他们叫苦力，因袭的习惯却管他们叫“红帽”，那是因为早年间，车站搬运工都戴个红帽子，如今不戴了，

名称却变不过来了。就象天桥如今没有桥可还称呼天桥，沟沿早成了大马路可还叫沟沿一样。红帽也好，脚行也好，苦力也好，反正是穷人干卖力气活儿，所以，也有称为“扛大个儿”的，干上这个活儿，熬到个五十多岁就九死一生了。

这一队“红帽”都扛着沉重的箱子，走得也不是队形，为了和旅客互相躲闪，只能凑紧了一块儿走。

一个头发已经发白了的搬运工，扛着一个很大的箱子，压得他上半身弯得极低，他气喘吁吁，两腿颤抖地走着，慢慢拉到了其它搬运工的后边。

“啪！”工头吴三甩起鞭子，一下子就抽在老搬运工人的腿上。

吴三骂着：“杂种，到你们家炕头上充老太爷去！你敢给我磨洋工！啊！”

老搬运工挨了这突然的一鞭子，两腿一抖，猛往前一栽，双手没有抓住肩上的木箱，一个踉跄，摔倒在站台上，木箱子沉重地砸在老工人的背上。他“吭吃”了一声，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又一口血喷出来，两手在地上抓了几下，身子一阵抽搐，突然不动了。

吴三嘴上叼着的烟卷儿微微抖动了一下，他眯缝起眼，看了看老搬运工，故意恶狠狠地大声骂着：“老家伙，甭跟我装蒜。回头有你好看的。今儿的工钱扣下了！”说着，他一抖皮鞭，大摇大摆地朝堆货的地方走去。

不大会儿，一个青年搬运工扛着箱子走过来，看见老人倒在血泊里，背上还压着大木箱子。他连忙放下扛着的货，奔过去，移开老人身上的木箱，扶起老人。

只见老人瞪着两个灰黄的眼珠子，脸上、鼻子、嘴、前胸都是血。嘴大张着，残缺不全的牙齿上和舌头上全是凝结

了的血块。

这个青年搬运工怔住了，抬起头来，朝前边大喊着：“李元，黑子，快，快来呀！”

正在搬箱子的李元，听见有人喊，便直起身，抬起头来。他中等个儿，黑瘦黑瘦的身子骨儿，光头，两眼深陷，直鼻子，不大的嘴，脸上也是乌光闪闪的，穿着“号坎儿”。他听见青年搬运工陈光赤的叫喊，回头一看，老人满身血倒在陈光赤的怀里。他急了，把手里的箱子一放，急忙奔过去。

李元蹲下身子，听了听老人的胸口，立刻站起来，说：“没了！”

陈光赤轻轻放下老人，叹了口气说：“饿的！”

李元没有吭声，翻了翻老人的身上，摸了摸老人的脸，掀起老人那条布片缀成的裤子，俯下身来仔细地看了看，摸了摸，脸上的神色大变。

“怎么了？”陈光赤盯着李元。

李元猛地站起身来，抓住陈光赤，两眼闪出怒火，叫着：“看见了没有？鞭子印儿，腿肚子上头，新印儿，刚打的。”

陈光赤摸了摸老人腿上的鞭痕，问着：“你说，是黑驴吴三给揍的？”

李元点点头，说：“走，找狗日的去。”

这时候，老人尸体旁边已经围了不少搬运工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吴三过来了，提着鞭子，推开搬运工们，冷冷地说：“都围在这儿干什么？死一个半个的臭苦力，可有什么稀罕。散开散开，还不都给我干活儿去！”

李元分开人们，迎着吴三走了几步，盯着吴三的脸，说：“吴头儿，您瞧瞧，老刘是怎么死的？”

吴三胖胖的脸蛋子颤抖了几下，上下打量了李元一阵，哼哼着说：“爱怎么死就怎么死。我赏他一领席子，你们下了工抬走一埋，不就结了么。”

李元指着老人腿上的鞭痕，问着：“这是您的手艺？”

吴三把眼一瞪，厉声地说：“怎么样？”

李元咬咬嘴唇，强压下怒火，问着：“吴头儿，刘大叔六十开外的人了，扛这么个大件儿，您就下得了手？”

吴三轻蔑地一笑：“六十开外，干吗不到炕头上享福去？早死早脱生。这老家伙是积了德嘛，下辈子脱生了财主家，吃香的喝辣的，丫头老妈子侍候着，别卖这份儿臭苦力么。”

李元瞪着吴三，眼里冒火。他猛地扑过去，劈头抓住吴三的脖领，咬牙切齿地说：“我宰了你！”

吴三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摆不脱李元那铁一样的胳膊。他手里的皮鞭掉到地下，晃着身子，翻着白眼。

搬运工人们赶紧拉开李元。

一个精瘦的大个子搬运工曹长禄抓住吴三的胳膊，扯着大喇叭嗓子叫着：“吴三，你说，刘大叔怎么死的？”

另一个年纪和死了的老刘差不多的老搬运工韩炳义跪在地上，一边掉眼泪，一边给尸体擦血迹，闭上满是血渍的嘴唇，合上瞪着的眼睛，弄平破烂的衣裳，喃喃地说：“老兄弟，你死得冤哪！扛大个儿，干到咱们这个年纪，一头栽倒起不来，也算是寿终正寝。可你呢，老兄弟，你腿上两条紫杠子，这是鞭子抽的啊！扛这么重的大件，腿肚子上挨鞭子，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二十大几的小伙子也是准死没个活。老兄弟，你死得苦，死得冤哪！你合上眼吧，这个年头儿，你不合眼也看不见顺眼的事儿呀……”

韩炳义这些话，更激恼了搬运工们。人们围上了吴三。

一个个有的怒容满面，有的阴沉着脸，有的捋胳膊挽袖子，有的大叫着：“一命抵一命！”

“揍死这条黑驴！”

人急了拼命，一群人急了，就是一场大火燃烧起来。

吴三吓得丢魂丧胆，哼哼叽叽地说：“唉，唉，哥儿们，父老弟兄们，别误会，千万别误会。是这么回事儿，老刘头是挨了我一鞭子，鞭子印儿在，我想蒙也蒙不过去。可那是今儿早上，离这会儿，少说过了仨钟头啦。他这会儿十成十是扛的太重，肚里缺食，头晕腿软，才落到这个份儿上的。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嘛。砸过去了，我心里也是难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吴三不是畜生，在地面儿上混，哥儿们彼此都得照应着点儿。这么办，谁叫我吴三是给哥儿们办事的人呢？都是站上不见街上见的。今儿免了大伙儿的回扣钱。我掏腰包，买口匣子，大伙儿出把子力气，把老刘头打发了，这还不行么？”

陈光赤看看李元，搬运工们也看看李元，都等着李元的一句话呢。

曹长禄却叫着：“光买匣子不成，要一堂冥活，一对香烛，十串金银锞子。”

“行，办圆满点儿，人生一世嘛，穷了一辈子，到阴间也该缓缓气儿。我全办！”吴三立刻接过话碴儿来，痛快地答应下来，紧接着又找补着说，“再买一千张大悲咒、往生咒，佛爷慈悲，老刘头兴许结个佛缘儿。这个也由我办。父老弟兄们，你们瞧行不行？”

李元皱着眉头没吭声，只是冷冷地盯着吴三，盯得吴三直发毛。

曹长禄追问着：“说话算话？”

吴三连忙说：“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吴三说一句是

一句，从来没说过谎话。”

陈光赤冷笑地说：“我看你这辈子也没说过实话吧？”

吴三看了看陈光赤，心里说：好呀，你等着我的。表面上却做出一副要对天起誓的神色，急忙说：“老刘的事，我吴三包了。为人还得讲点义气。说了不算，天打五雷轰！”

韩炳义从老刘头的尸体旁站起来，朝大伙儿说：“我瞧着行了。吴头儿肯出钱办个体面丧事，老刘兄弟也算能入土为安了。”

李元心里盘算着，眼下也没当场抓住吴三害人的真凭实据。再说，站上有日本宪兵，日本稽查，有警察，又有中国稽查。要不是吴三胆子小，光棍不吃眼前亏，他真嚷嚷起来，大伙儿也没好处。这年头儿，在车站上扛大个儿失手栽倒站台上死了的，老刘头也不是头一个。要是验尸，两条皮鞭印儿，法医还不是听吴三怎么说就怎么应承么？想到这儿，只好说：“算了，就这么办！”

吴三这才松了口气，挺起胸脯，笑着说：

“哥儿们，公案已了，先把老刘搭开，咱们各人干各人的活儿吧？”

几个搬运工抬走了老刘的尸体。人们各自散开了，扛起箱子，又搬运起来。

吴三陪着笑脸，看着散开的搬运工人们。

大个子曹长禄拉住李元，边走边粗声瓮气地说：“黑子，你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在站上揍黑驴吴三，还有你的便宜？”

韩炳义也埋怨着：“兄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满站上都是吴三的人，他要一叫唤，咱们就倒霉啦。多亏这小子机灵，破费他几个钱。可提防着他转过身给你一口呀。”

李元气哼哼地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是一条命，还怕他老儿？”

曹长禄叹着气说：“不行啊，兄弟。你有老娘，我有一家子牵累。要不，宰他黑驴吴三，轮不上你，我早下手了。”

提起老娘，李元叹了口气，扛起箱子，大步走了。

那一边，吴三叫住了陈光赤，冷冷地问：“小子，是你捅的马蜂窝？”

陈光赤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也冷冷地说：“吴头儿，都是中国人，别挤兑得穷人没路走。您在地面儿上是个人物，您当然明白，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吴三脸色一变，刚要破口大骂，忽然又狡诈地一笑，拍着陈光赤的肩膀，亲热地说：

“有种！我在前门大街，天桥地面儿上混了几年，眼里揉不进砂子。你行，是条汉子，有心有肺，有血性。跟着我干怎么样？我每天给你加二成工钱，按月给二十块津贴，你少扛点活儿也没关系。其实，也没别的，没有让你干过不去的事，就是有事没事给我盯着点儿，传个话儿。就为交你这个朋友。成不成，凭你一句话啦！”

陈光赤哼了一声，说：“吴头儿，你想着给老刘买口棺材吧，全堂冥活、香烛纸钱也别忘了。”说着，大步朝货堆走去。

吴三站在那里，恶狠狠地盯着陈光赤。心想，杂种，跟我眼前玩花样，专门挑事拨非，赏你脸都不知道兜着，哼，等着你的，瞧着我的。还有李元、曹长禄，小子们，你们全都别臭美，我吴三要能咽下这口气去，我是你们养的，是天桥暗门子养的！他捡起掉在地下的鞭子，掏出烟卷儿，点上烟，眨着眼，憋着主意。

2

北京的冬天，黑得特别早，五六点钟，昏黑的夜幕就拉下来了。前门大街两旁的商店灯火辉煌。亿兆百货商店门前挂着扩音喇叭，放送着流行歌曲：

“香槟酒气满场飞……

进进退退

勾肩搭背……”

尖尖的女声，妖里妖气的调子，在大街上散播着，招徕着顾客。

长春堂中药店门前的扩音喇叭，放送着评书老艺人王杰魁播讲的《七侠五义》。那苍老的，慢吞吞的声音：“这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背插单刀，直奔冲霄楼铜网阵……”药店门前摆着大碗茶水，一面牌子上写着“施舍药茶”。拉洋车的、卖苦力的、捡破烂的、打小鼓儿的、换“洋取灯儿”的，都坐在店铺前边的台阶上，一边喝大碗茶，一边听评书，有的把冰凉的窝头拿出来，就着热茶，吃上一顿也算是美美的饭了。这时候，若碰巧有人喊洋车，拉洋车的一定陪笑地回答：

“歇啦，劳您驾，您多走两步！”他情愿少挣几个钱，也要听听书，喝喝茶，在寒风凛冽中求一会儿享受。王杰魁老先生的“净街王”美名就这样传开了。

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勾了银边儿、黑绒边儿的旗袍，提着红色的、米黄色的小手袋，长腰肉色袜子，缎子面儿绣花皮底鞋，打扮得不中不洋，来到商店门前、饭庄、戏园子、旅馆门前徘徊着。穿得破旧一点儿的年纪又大了一点儿的女人站在路灯底下，眼巴巴地盯着行人。夜的降临，她们悲惨的职业开始了。

戏园子里锣鼓喧天，饭庄的楼上呼噜喝雉，猜拳行令，大嚷大叫。汉奸们，阔老板们，军官们，开条子叫来姐儿在那里吃喝玩乐。涮锅子的热气驱走了严冬的寒冷，他们脑袋上冒着热气，渗着汗珠子。

几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日本兵，手里拿着太阳商标的酒瓶，晃晃悠悠大摇大摆地在前门大街上横冲直撞。他们扯着鸭子般的嗓子，唱着日本战歌。女人们四处躲藏，行人们四散逃避。

一辆辆黑色的警车尖声鸣叫飞驶而来，卖小吃的，要饭的四散逃避，车队驶过去了，他们又开始了叫卖吆喝，夹杂着“老爷太太行行好吧”的讨饭声……

北京的阴暗、悲惨、喧嚣、热闹和血腥的夜生活开始了。

前门火车站上的搬运工人们，干完了白天的活儿，领了几块钱工钱，拖着疲乏的脚步，三三两两走出了车站。打夜班的搬运工还在象牛马一样驮着笨重的行李、货物、木箱、甚至军火，吆喝着，奔忙着。

李元领到了几块联合票，披着破棉衣，走出车站。一阵阵西北风吹得他直打冷战。上半晌，他和陈光赤、曹长禄、韩炳义几个伙伴，将老刘头埋到了乱葬岗子，在小坟堆前烧了冥活、锞子、纸钱、往生咒和大悲咒，眼看着纸灰让

风吹得围着坟头上直转。老刘头没儿没女、没家没业，辛苦了一辈子，惨死在站台上。这十几个“红帽”弟兄朋友们尽了自己的力量，总算是让老刘头入土了。在坟头前边，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搬运工都哭了一阵子。人们的心象是掉在烂泥塘里，谁也说不出安慰人的话来。李元心里想，趁着自己年轻力壮，卖上死力气，多挣几个钱，让老娘过几天有窝头小米粥吃的日子，等老人家百年之后，能有一口“火匣子”入土，坟前头立块碑，自己就算尽了孝道。从老刘头的死，李元和那些上年纪的搬运工一样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无非是背呀、扛呀，压弯了腰，压驼了背，等到手脚不灵，上了年纪，一个跟头就爬不起来。那时候，自己这把子骨头，能埋在这块乱葬岗子也就算是有了着落。他蹲在坟前，拿着一根枯树枝，拨弄着纸灰，一言不发，两眼发直。几个人在坟前都是这么不哼不响，失神地看着盘旋而起的纸灰，呆呆发怔。

曹长禄烦了，他站起身来，摇摇腰腿，扯着大嗓门儿，朝大伙儿说：“别怔着啦，这年头儿，咱们这些臭脚行臭苦力能有块坟地就算是福气啦。走，黑子，咱哥俩下小馆喝几盅去！死了的一死百了，活着的不能光受罪，也得变着法儿苦中求乐呀，走！”

曹长禄外号叫“二踢脚”，就是一点着了响两下的那种鞭炮，是个火爆脾气，心直口快，人缘儿挺好。他有一家子老老小小，全仗他一个人养活。要是碰上搬运工谁有个大小难处，他见到了，就没个不帮忙的。在这一点上，他和李元最投脾气。别看李元死卖力气一心想多挣几个钱养活老娘，也总是带不回去所有的钱。他们俩，就有一样不对脾胃，曹长禄好喝两杯，还是两杯下肚准醉，一醉就来火儿，骂工头，骂日本，什么犯法骂什么。就为酒后骂了日本天皇和日本侵

略军，宪兵队抓过他两回，压杠子、灌凉水，从鼻孔里灌辣椒水，打了个死去活来，放出来之后，他是原样儿不改。李元就不同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逛天桥半掩门的土窑子，平常也不发脾气，话都不多说一句，碰上工头欺人太甚的时候，李元忍不住的时候，脾气发起来就不大好收拾。他年轻力壮，扛大个儿，练就了腰、臂、肩、腿的功夫，又学过几天拳脚，真动起手来，三五个大汉近不了身。曹长禄是心眼儿直，动不动就冒火，李元是心眼儿直，不到万分难忍不冒火。为了这个，搬运工敬重他比敬重曹长禄显着高了一些。这时，他听到曹长禄拉他喝酒，他头一回没反对，跟着曹长禄在天桥小酒铺闷闷地喝了二两。曹长禄喝过酒，一路上骂骂咧咧。李元只是觉着脑袋发胀，浑身发热，心里头有点儿烦闷又有点儿迷迷糊糊。也许是李元一路上怕曹长禄闯祸捅漏子，把八成精神用在大个子身上了，反倒显得自己挺清醒。两个人回到车站，又干了一下午的活儿。领工钱的时候，黑驴吴三出奇地满脸陪笑，说话还挺算数，连二成回扣也没要。工人们平静无事。李元拿了这几块钱，走出了车站。

李元特地到门框胡同给老娘买了二两烂烂的驴肉，买了两个火烧、几个馒头，包到手巾里。心想，让娘也开开斋吧！老人家跟着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大米白面很少吃上，连油星星也捞不上几滴。想到这里，李元难过地叹了口气，抬起头，看了看大街上的红男绿女，他快步从他们身旁走过。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只是心中不平，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走着，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是别人的世界。他一点也不羡慕这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男男女女，他觉得凭力气挣钱，凭卖大个儿养活老娘，一不亏心，二不缺德，饿着肚子睡觉也对得起良心。今天，李元的心情显得和往日不一样了，

老刘头的死，给他心里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为什么穷人就一定要这么死？凭什么卖苦力气还得挨工头的鞭子？又凭什么工头儿身不动、膀不摇，提着鞭子，叼着烟卷儿，就大把大把地挣钱？一路上，他低着头，捧着盛驴肉火烧的小包，走出前门大街，走过珠市口，走过天桥，进了小胡同，他到家了。

家，不过是一间又矮又低又小的土房子，下雨漏雨，刮风透风。在这个大城市里，他们是点不起电灯的。刚刚走过灯火明亮的地方，这里就更显得昏黑一片。小胡同地上坑坑洼洼，到处是垃圾、炉灰、粪便，脏水冻成了薄冰，牛羊骨头凌乱地抛在地上，脏土炉灰堆得小山似的。不少大人小孩冒着寒冷，在夜色苍茫中搜寻着一点点能烧的煤核儿，能吃的残菜叶子，能熬出一点点油腥儿的牛羊猪骨头。不错，这里偶然间也有一盏路灯，发出暗黄色的光，把这一幅景象映得更增添几分悲惨。这里是卖苦力的，拉洋车的，捡破烂的，磨剪子磨刀的，补漏锅的，卖掏耳勺的，钉鞋补掌的，剃头刮脸的，换“洋取灯儿”的，吃开口饭算卦相面的和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们的“天堂”。因为，比起躺在冰凉洋灰地上，盖着麻包片子的无家可归的人们来说，这里到底还是个家啊！就是死，总还是躺在炕上咽气，比起死在大街上小巷里的“路有冻死骨”的倒卧者来，总算是又强了几分。

李元推开门，掀开破门帘，走进家了。

家里几乎是一无所有。五尺见方的屋子，迎门一座土炕，炕边摆着一张小桌，桌子腿儿是用木柴扎绑起来的。桌边立着一个小柜子，是搬运货物时捡来的木箱子，里边装着锅碗瓢盆。炕上摆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这是地地道道的箱子，据老娘说这个宝贝箱子是老娘的老娘的陪嫁，早年间它是大

红漆的，箱子上凡是破的地方，都用碎布粘起来，随着岁月增长，箱子就变成了黑灰色。箱子里是母子二人的全部财产——几件破衣裳，还有一滴汗一滴汗积攒起来的几十块钱。屋子里，看不见粮食缸，也没有椅子、凳子。墙角那儿摆着一个半截水缸，盛着水，有点儿生活气味儿的是半截水缸里养着的两条鲫鱼。明白人都知道，水缸里养鱼，不是为着好看，是为着水缸里别生蚊子崽——孑孓，少落点灰尘。喝水、煮饭用水，全都靠着这半截破水缸呢！再显出有一点儿喜星味儿的是墙上贴的一张“抬头见喜”的吉祥字儿，但早就熏得发黑，认不出字儿了，可在人们心里，还多少透着点儿吉利。

李元的母亲六十多岁了，身子骨儿还算硬朗。这会儿，她正蹲在地上，低着头，细心地为捡来的煤核儿分类。整齐一点儿的堆成一堆，到晚市上还可以卖几个钱。它比煤球便宜得多。穷苦人，特别是小学老师、小职员们，挣的工钱少，人口多，碍着穿长袍的家庭身分，拉不下脸去四处捡煤核儿，就买这个去。老娘捡的煤核儿不掺焦子，有几个固定家庭主妇来买，老娘差不多是半卖半送，多少挣几个钱。用老娘的话说：人家先生是教书的，办事的，年头儿不济，撑着个家不容易。先生家脸面要紧，咱们多出点力气，卖一半儿送一半儿，也算是尽点心意，帮点小忙。捡剩下那些散碎一点儿的，就留着自己家里用。这会儿，她拿着一根短短的铁条，正在煤核儿上轻轻地敲打着。

“娘，您怎么不点上灯？歇会儿吧！”李元将破棉衣放在炕上，朝老娘笑着说，“您猜，给您带来点儿什么？”

老娘慢慢地站起来，喘着气，敲着腰板，点上了豆油灯，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李元，摇摇头说：“我哪儿猜得着，